

1960s 以降的美國貧窮理論： 回顧與整合*

呂朝賢

王德睦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

本文從 60 年代的貧窮文化論點為始，檢討 60-90 年代之間對於貧窮議題的解釋論點。我們藉由三個理論面向：缺乏取向、選擇取向與限制取向，去解析各個不同論點中的主要假定與論點之間的可能關係，並討論各個論點的限制與可能的政策意涵。檢視結果發現，各個論點中雖隱含著不同的假定，然而這些假定之間都有很密切的發展關係，在這之中貧窮文化的論點可視為 60 年代以降不同貧窮理論的主要源頭，各個理論莫不是對其的補充與批判建構而成。然而，在我們所論及的論點中，對於貧窮動態的解釋卻相當薄弱或根本忽略了。因此本文的結論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將家庭帶回貧窮的解釋之中，透過對於家庭的研究，來補充以往理論的不足。

關鍵詞：貧窮文化，人力資本，地位取得，雨露均霑論，情境觀點

壹、前言

1960 年代美國總統詹森提出「對貧作戰」政策後，學術界中有關貧窮的解釋理論紛紛被提出，甚至被美國當局引用以作為政策合理化的基礎。此一時期，有五個主要的論點被提出或被引用來解釋貧窮，他們分別是：貧窮文

* 感謝匿名審查教授的指正，文中謬誤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88 年 1 月 6 日；接受刊登日期：88 年 6 月 29 日

化理論 (Culture of Poverty)、人力資本論 (Human Capital)、地位取得 (Status Attainment)、雨露均霑論 (Trickle Down Thesis) 與情境觀點 (Situational Perspective)。此五種論點對於七〇至九〇年代的貧窮問題討論之影響主要有二：一、後續理論所討論的議題，如：所得取得、貧民行爲、貧窮動態 (Poverty Dynamics)、家庭結構與貧窮等議題的討論，在五個理論中或多或少已經有所著墨。換言之，六〇年代的理論幾已底定了後續理論的論述範圍；二、這五個理論奠定了七〇至九〇年代的貧窮理論架構基礎，後續理論莫不是以對他們的補充、批判建構而成。其中貧窮文化理論 (Culture of Poverty) 所受的爭議最大，不僅影響了六〇年代的貧窮理論與討論議題，至八〇與九〇年代關於居住區貧窮 (Ghetto Poverty) 議題的討論中，貧窮文化的角色依然相當重要。

雖然六〇至九〇年代的貧窮理論有如上的關連存在，但以往的討論卻經常忽略了這些共通性，僅將他們當做個別存在的理論，分別陳述。事實上，這些論點表面上的歧異雖大，例如：人力資本論與地位取得是以個人為分析的對象，以個人或家庭的特徵來解釋貧窮。而新結構論 (New Structuralism)、Wilson 的觀點，則偏向於以總體的角度（如：工作機會結構、人口組成）來解析居住區貧窮的問題。前二者著重於個體貧窮，研究個人或家戶為何會低所得的原因，而後三者則著重於總體貧窮的解釋，解析貧窮數量分佈的問題。至於貧窮文化則是著重於研究貧窮人口群的特徵，特別是行爲特徵；及這些行爲特徵如何引致貧窮的持續發生。但如我們深究這些論點，則可發現他們之間是有共通性的，其分野也不是如表面所看到的只是研究對象與重點的區別，且誠如前述所言，這些理論在發展上互有影響，不同論點間的辯證往往是新論點被創發的主要理由。在實際的經驗研究中，研究者居多也是混合著使用這些論點來解釋貧窮。

因此基於理論上的興趣，本文的目的首在揭露這些理論基本的假設、差異性與共通性，然後再討論這些論點的限制與定位，最後依上述討論結果提出貧窮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

貳、分析要點

因為有些理論的形成往往是為了反駁既存理論的缺陷而來的，如：貧窮文化理論相對於情境觀點。因此，依理論發展的時間來分別陳述理論的內涵與理論間的發展關係，是本文後續論述次序的根據。之後我們將依這些討論的結果，歸納檢討下述二個議題：

一、自 1970 年代晚期，美國國內的福利依賴與底層階級問題逐漸浮現，這二個問題引起貧窮研究者對於貧窮動態問題的興趣。¹ 研究貧窮動態的重要性有二：1. 家戶或個人的經濟狀況猶如個人的健康狀態一樣並非靜態，而是健康與生病交替的動態過程。因此貧窮動態研究有助於我們更貼切的了解貧窮的本質、特性與型態。2. 貧窮型態既然非單一，則政府應提供不同的措施因應之，例如：對短期貧窮者，採用短期的經濟補助即可；對長期的貧窮者，如有工作能力則可增加其教育與技能，使其能自立自助，若完全無工作能力（如：老人）則需提供其未來的安養照護。因此，對於貧窮動態的理解，不僅有助於理論的完備性，也有利於我們設計政策來因應貧窮現象。然而，以往研究中較少檢視各理論對於貧窮動態現象的看法為何。² 是故在本文中

-
- 1 所謂貧窮動態，如解釋對象是個人或家庭則可分為三種流動型態：1. 致貧，由非貧至初入貧窮狀態；2. 持續貧窮，由第 1 年或第 n 年持續至第 n+1 年貧窮；3. 脫貧，由貧窮至非貧。而解釋的對象若是貧窮的數量，那麼貧窮的動態可以從二個角度來觀察之，一是指貧窮數量在不同時期間變化的過程，另一則是指貧窮數量中，新生率、持續貧窮率與脫貧率的解釋。
- 2 貧窮動態的經驗研究成果有如下三項：一、改變了以往橫斷性研究及理論（尤其是貧窮文化理論）對於貧窮人口的認知，以為窮人是個穩定的群體，長時間的停留在貧窮的地位中。這些貧窮動態經驗研究（Duncan, 1984; Rank, 1985; Bane & Ellwood, 1986; O'Neill et al., 1987; Blank, 1989; Walker & Karl, 1994）指出窮人並非是同質的團體，且多數屬於短期貧窮者。二、短期貧窮家戶的特徵與長期貧窮家戶在特徵上差異不大（Duncan, 1984），但持續貧窮者以女性戶長家戶居多（Walker & Karl, 1994）。三、從相關的研究中（Bane & Ellwood, 1986; O'Neill et al., 1987; Blank, 1989）我們發現婦女（女性單親家庭）脫離貧窮的機率受到婦女（女性單親家庭）中小孩子數、薪資率、其本身教育程度的影響，小孩子數愈多愈不易脫離，薪資率與教育程度愈高則愈易（快）脫離貧窮。然而，這些經驗研究所著重的多是對某一項假說的檢證或僅描述經驗資料、修正貧窮持續的測量、修正分析方法、及對資料使用的檢討等層面，雖然這對理論的建構有所幫助，但依然不夠充分與豐富。

我們將試著檢視各個理論對於貧窮動態的看法為何。

第二，本文認為現今已存在的貧窮理論可以分成三大類，一是缺乏觀點 (Lacked View)，二是選擇觀點 (View of Choice)，三是限制觀點 (Restricted View)。缺乏觀點主要包括人力資本理論、地位取得論點等，主張個人或家庭內在條件的缺乏，如：能力不足、工作態度不佳、家庭資源有限等等因素是個人或家庭陷於貧窮的主因。選擇觀點則認為貧窮是個人或家庭自我選擇的結果，選擇的基準可能是經由理性的計算或依本身態度與價值而定，貧窮文化理論、Murray 及 Mead 觀點中皆含有選擇的成分。限制的觀點，則認為窮人的一切表現與狀況是因為外在環境限制所致，換言之係因「人生選項有限」，使得他們不得不陷於目前的處境，包括配誤論 (Mismatch Thesis)、新結構論、情境觀點等。³ 不過並非每一種理論都可以很清楚的分類在上述三類中的一項，有可能理論的內容含涉上述三類中的某些部分。因此，本文後續的分析中將僅以各個論點中最核心的假說來為理論做定位，我們認為如此的分類雖不完美，但卻有助於我們更深切理解各種不同理論的內涵與政策上的可能因應之道，如再配合上前述的幾個討論面向，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各種不同理論的背後預設，限制，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參、貧窮文化

真正有系統描述與解釋貧窮現象的理論應可回溯至貧窮文化理論。此理論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 Michael Harrington, Oscar Lewis, Walter Miller 及 Edward C. Banfield。貧窮文化理論對於貧窮研究與政策的影響相當深遠，甚至八〇年代的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點，及八〇年代美國福利政策的改革，依然受貧窮文化理論的影響。在這些代表性人物中，Lewis 對此論點的討論最多、爭議也最大，因此本節選擇他的觀點為主要的評述對象，至於 Lewis 論點與其它論點的相關性，則放在第九節再陳述。

3 個人與家庭能力無法補足的稱為限制，而家庭與個人能力可以克服的稱為缺乏。事實上每一個理論或多或少都含涉這三個面向，只是各有不同的著重點罷了。

一、貧窮文化的意義與要點

在 Lewis 的觀念中「貧窮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模型 (Conceptual Model) 的標籤 (Label)，是一個擁有自己的結構與理性的社會次文化。它表達著生活在階級化 (Class Stratified)、高度資本化、個人化社會下，貧民對其所處邊陲位置的一種適應與反抗。亦代表無法取得盛行價值與目標下成就時的一種應付絕望與無助的努力。換言之，貧窮文化是貧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方法，它提供無法達到主流規範要求的人們，適應剝奪環境、或自我安慰 (報酬) 與防衛的機制 (Lewis, 1966; 1968)。Lewis 終生皆試圖建構貧窮文化這個概念工具，以理解貧民的生活困境與因應生活困境所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的特徵及其長遠的影響。但可惜的是，Lewis 對於貧窮文化的論述相當片斷 (多在書的導論部分)，且用許多模糊與定義不清的概念來組織他心中的想法，他的實際經驗研究亦不充分與嚴謹，以致他的論點遭受到很多的批評 (沙學漢, 1974)。但不可否認的，Lewis 對於「貧民防衛機制的特徵，或稱該次文化的特質與影響」，「貧窮文化形成的情境條件」與「因應該現象的對策」等方面的論點創意影響深遠。

要點一：貧窮文化形成的條件

就貧窮文化產生的可能條件，在 Lewis 的文章中大致可歸納出三種說法：一、Lewis 認為貧窮文化最有可能的「候選者」是來自於急劇變動社會中的底層階層 (Lower Strata)，且這些人已部分的疏離該社會。Lewis 舉例指出，在拉丁美洲與印度皆有大量的鄉村居民移入都市之中，但由於前者多係因失去土地而由鄉村移至城市的工人，而後者則多從具有良好傳統文化的穩定農村移至都市，因此在理論上，前者較後者更易迅速的形成貧窮文化 (Lewis, 1966; 1968)。二、當一個階層化的社會與經濟體系崩潰或被其它制度取代時就會發展出貧窮文化，如：由封建制度演變成資本主義或技術快速變化的時期 (Lewis, 1966; 1968)。三、Lewis 認為貧窮文化可能形成於不同

的歷史脈絡，成長與盛行於下述六種社會情況中（Lewis, 1968）：⁴

- i. 貨幣經濟、薪資勞動，和為利潤而生產。
- ii. 低技術工人持續很高的失業與低度就業率。
- iii. 低薪資。
- iv. 無論政府或志願組織並無針對低收入人口提供社會、政治與經濟組織。
- v. 親屬系統是平系的而非單一的。
- vi. 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是強調財富與資產的累積、求上進與節約，低經濟地位被視為係個人無能或卑劣的結果。

前述中 Lewis 提出幾個貧窮文化發生的條件。但 Lewis 的研究並未一一檢證這些條件的真實性，亦未說明這幾個相似條件間的關係到底為何。不過，這幾個 Lewis 所提出的貧窮文化發生的條件，卻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 Lewis 會推衍出以下將論及的貧窮文化的特徵，及解決貧窮文化問題的手段。

要點二：貧窮文化的特質與影響

在 Lewis 眼中，貧窮文化是超越國界、區域和城鄉差別的。無論它在何處發生，它的成員在家庭結構、人際關係、消費習慣、價值系統和時間取向上都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Lewis, 1959; 1966）。Lewis 的研究大約鑑別出七十種貧窮文化特徵，這些特徵包括：次文化與大社會的關係、貧民社區的本質、家庭的本質、及個人的態度、價值與人格結構等面向（Lewis, 1966; 1968）。而且 Lewis（1968）也指出這些貧窮文化的特質具有幾個特性：i. 同一類別內的特質在功能上互相關連；類別與類別之間的特質，亦「多數」具有功能上的關連。ii. Lewis 認為不能僅用貧窮文化中的一二項特徵來檢視某一地區是否有貧窮文化的存在。iii. 貧窮文化可以這些特質來定義，生活在貧窮文化的人在統計上出現上述文化特質的次數與種類高於其它群體。iv. 在不同的國家文化脈絡下，貧窮文化的輪廓可能會不太一樣。

再者 Lewis 認為貧窮文化一旦形成，將有自我延續的傾向，該次文化所

4 這部分的翻譯參考沙學漢（1974）的著作。

蘊涵的「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透過家庭機制傳達給居於貧民區的兒童，使得他們在心理上很難接受外界可能發展的機會與條件，而產生貧窮代間相傳情況 (Lewis, 1963; 1966; 1968)。但在他對於 Charles A. Valentine 所著的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一書的回應中，他認為當時的一些學者誤解了他的理論，尤其是錯誤的以為他所提的貧窮文化自我延續因素僅是指貧民的內在心理因素一項而已。相反的，Lewis 在此時認為所謂的貧窮文化的成因「從長遠角度著眼，我的立場是廣大社會的基本結構，遠比那種自我延續因素來得重要」 (Valentine et al., 1969)。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晚期的 Lewis 已修正了家庭在貧窮文化代間相傳機制中的重要性，且已注意到貧民所處社會結構對於貧窮文化形成與延續的影響。這一修正不僅使他的理論更完備，也更能被接受 (沙學漢, 1974)，但可惜不久之後 Lewis 即去世，並沒有更深入研究解釋其所謂的廣大社會基本結構為何，及該結構如何地影響貧窮文化之形成與延續。

要點三：因應貧窮文化的對策

那麼如何消除貧窮文化呢？Lewis 一方面認為應依處於貧窮文化中的人口多寡分成兩套解決策略。對於美國（指 60 年代）所採行的提高貧民的生活水準與整合貧民進入中產階級的作法，係以精神醫學的處遇 (Psychiatric Treatment) 為基礎。但此法似乎不適合低度發展國家，因這裡多數人依然生活在貧窮文化裡，所以應透過較革命性的作法，如：藉由社會的基本結構變遷、財富重新分配、組織窮人並給他們對於權力和領導的歸屬感。如此作法雖不一定能成功的解除貧窮本身，但卻有助於消除貧窮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徵 (Lewis, 1966; 1968)。另一方面 Lewis 基於貧窮文化主要特質是反映出缺乏或公然拒絕參與社會主要的制度，因此建議窮人如能有階級意識或成為社會的活躍成員或能以國際性的觀點看世界的話，則有助於他們脫離貧窮文化。而他亦認為，不論何種運動，只要能組織和給窮人希望，有效的促進他們對團體的認同感與連帶關係 (Solidarity)，皆有助於打破貧窮文化的社會與心理核心癥結 (Lewis, 1968)。

從上述 Lewis 所提的解方中顯示他並未忽略貧窮文化形成的結構條件

限制，解決的方式亦依所處的情境條件而異。他的解方也指明貧窮與貧窮文化兩者事實上是不同的，應該有不同的解決方式。不過在文獻的討論上與引用上大多只提及要解決貧窮文化需要改變貧民的行為、態度與價值，而忽略了 Lewis 晚期對於貧窮文化形成的結構性看法。

二、限制與貢獻

Lewis 提出貧窮文化論點後，經由 Michael Harrington 所著的 “*The Other America*” 一書的推波助瀾，而受到美國社會的廣泛注意，進而影響 60 年代美國對貧作戰計劃的內容。但相對的，貧窮文化論點也受到其它研究者的嚴厲批評，這些批評包括 Lewis 的研究方法缺失、貧窮文化理論背後的價值預設潛藏著對窮人的歧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貧窮文化概念的模糊與邏輯上的矛盾、研究資料的不適當等等 (Valentine, 1968; 1971; Leeds, 1971; 沙漢學, 1974)。而在經驗研究中其所指稱的貧窮文化特徵也少受支持 (Kerbo, 1991)。換言之，多數的批評者認為「貧窮文化」事實上並不足以被稱作文化，充其量只能被當成一些行為特徵，其成因主要是因應外在社會情境的適應結果，而非自其本身社會內部發展而成的，因此可以說是社會結構的影響遠大於濡化的作用。是故，貧窮可能並非窮人所能選擇的結果，而是窮人並沒有選擇的機會，係被決定的結果，意即是廣大社會結構因素造成貧窮，而非貧窮文化 (Leeds, 1971; 沙漢學, 1974)

Lewis 的貧窮文化理論對於 60 年代以降的貧窮研究有深遠的影響。有的論點係以它作為批評的對象而建立起來的，如：情境觀點。新保守主義提倡者則把貧窮文化當做是解釋新貧窮現象（福利依賴）的重要理論，如：Lawrence Mead 與 George Gilder。而自由主義者如 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孤立文化論點雖主要參考情境觀點的說法，但也等於間接受益於貧窮文化理論。而 Lewis 所採用的以家庭做為分析貧窮的單位及討論貧窮的代際移轉問題，也間接的影響到 80 年代以降有關貧窮與家庭結構關係，及貧窮動態的研究。

肆、情境觀點

一、理論假設

情境觀點主要出自 Rodman (1963)、Rainwater (1968、1970) 與 Gans (1968) 等人對於低階級文化問題的討論性文章中。基本上該論點可視為對貧窮文化觀點的一種反省。該學派的主要假設有二：

假設一：同意貧窮文化所言，貧民有特殊的行為模式與個人特徵，但否認貧窮文化認為貧民不喜歡主流社會的價值、行為與規範

在情境觀點下，窮人的異常行為、價值與規範，其實是適應環境的結果；即因為他們缺乏資源以達成主流社會文化的目標，為因應現實的生活困境而發展出的生存技能 (Rodman, 1963; Rainwater, 1968; 1970)。其實窮人在內心上並不滿意目前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僅認知主流社會的一般價值，而且也渴望能夠透過正常的手段來達到主流文化所設定的目標。但在達到目標的資源有限與生活在被剝奪的環境下，他們無法達到這種價值的要求，因此只好以「曲解價值」(Value Stretch)，或發展替代的價值或低階級文化，忍受較不完美的或偏離主流規範的行為以因應所面對的生活困境 (Rodman, 1963; Rainwater, 1968; Della Fave, 1974a, 1974b)。這種適應現實環境所呈現的適應性的低階級文化有其侷限功能自主 (Limited Functional Autonomy) 作用，可使他們暫時地免於因無法取得主流社會規範要求而產生壓力之功能，並有助於他們適應具剝奪 (Deprivation) 與排除 (Exclusion) 性質的生活環境 (Rainwater, 1968; 1970)。

假設二：生活情境的改變有助於貧民脫離當下的困境，進而向上流動

那麼如何解決窮人的生活困境呢？情境觀點者的主張是改變生活情境 (社區、社會、生態的情境)，以擴大參與主流社會的通道與均等化資源分配來達到；即讓這些窮人有充分的向上流動管道、充足的機會與可支持取得這些機會的資源，如此窮人就能脫離他們目前的生活方式，而達到主流社會文

化要求的目標。乍看之下，情境觀點與貧窮文化其實很相像，皆是討論窮人的生活特徵；特別是陷入貧窮後的行為模式。但不同的是，情境觀點認為窮人的特徵是機會與資源限制下暫時因應現實生活的策略，如果限制去除了，則特徵隨之改變。但貧窮文化雖亦支持前半段的說法，但他們更認為這些窮人在形成這些生活的特徵或次文化後會再回溯影響下一代，即使限制去除了也無法改變這種惡性的循環。換言之，情境觀點駁斥貧窮文化論所認為的「窮人不喜歡主流社會大眾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根源於所持的價值不同所致」等二項看法 (Kerbo, 1991)。

二、限制與貢獻

情境觀點雖在實證上較貧窮文化受到更多支持 (Davidson & Krackhardt, 1977; Carmon, 1985)，亦已查知到結構條件，如：社會、經濟、政治、社區力量與人口特質，是個人不遵從主流規範及致貧的主因。但就其理論的討論而言，似乎還是在研究貧窮的後續影響，尤其是對貧民行為的影響，及反駁貧窮文化理論的缺漏，而較少著墨於這些結構條件的限制如何影響貧窮的產生 (Kerbo, 1991)。再者，該論點也太簡化行為與環境兩者的關係，人們並不會自動的順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Gans, 1968)。事實上這個缺點，情境觀點學者並非未查知，如：Gans (1968) 雖認為行為的模式、規範與期望的發展是適應既存的情境而來，但並非情境改變，規範（或行為模式、或期望）就馬上反應且改變，兩者間有差遲 (Lag) 的關係。再者，Gans 也認為文化是混合行為規範與期望的產物，它影響行為，有些行為是隨著情境的改變而變，但有些則非如此。後者會形成新的行為規範，再回溯影響未來的行為。然而，或許情境觀點學者多數是立基於反駁貧窮文化理論的不合理處，而未能提出更有組織的理論架構來組織該論點的長處與補充不足處，以致我們無法自文獻中看出更深入有見地的論述。

即便如此，情境觀點對八〇年代的貧窮研究亦產生一些影響，如 Wilson (1987) 所提出的論點社會孤立 (Social Isolation) 假設，著重於情境結構限制對於地區居民行為的影響，本文認為這多少係受到情境觀點的啟發而產生的更精緻的理論假設，這是情境觀點理論在提出貧窮文化理論缺陷之外，另

一個重要的貢獻。

伍、人力資本理論與地位取得模型

一、理論假設

人力資本理論與地位取得模型基本上皆源自新古典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對經濟秩序的看法。他們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因此個人社會經濟秩序中不相等的安置係因家庭背景與個人不同特質的表現結果（許嘉猷，1986）。解釋貧窮問題並非此二論點創立的目的與理論原本所欲解釋的主要社會議題。但就貧窮研究的發展歷史來看，他們對貧窮理論與政策的發展，事實上有很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人力資本理論被廣泛的引用於貧窮研究與福利服務的設計上。這二個論點的理論假設有如下三個：

假設一：個人薪資的差異由個人不同的生產力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寡與人力資本有直接的相關⁵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個人在勞力市場中薪資的高低受個人生產力決定，而個人的生產力則視個人人力資本儲量（Stock of Human Capital）多寡與品質而定。人力資本儲量是個人人力資本的總合，係由個人不同生命週期階段中的投資所累積而成的。但由於難以直接測量生產力，一般經驗研究皆以影響生產力的工作者特質，如：教育程度、工作經驗與在職訓練等指標來預測薪資（Treiman & Roos, 1983）。簡單的說，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與勞動生產力有直接的相關，且勞動者個人深信目前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在

5 該假設可再細分為三：一、假設個人所擁有人力資本量與市場所得兩者間有相符的關係（Consistent Relationship），如果不相符，那麼就很少人願意投資了。二、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人們知道他們可能的選項，並能夠自由的決選。所以如果在他們自願的決定下選擇錯誤，那麼他們的窮困就可被理解。三、假定既存遍佈的機會，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增加其所得，那麼就需要對人力資本做投資。因此一個人之所以未能找到好的工作，被認為是缺乏充足的進取心或勤奮不夠。他們在教育、技術與能力上較其它人差，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早期在學校中缺乏動機努力學習。所以從上述陳述來看，個人是可以完全掌控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Schiller, 1995）。

未來將在勞力市場中，依對工作之勞動生產力的多寡而得到公平地報償 (Lichter et al., 1993)。

故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觀點來分析貧窮時，即意謂著當個人的人力資本儲量少時，其工作的生產力或潛在生產力就較少，不僅在勞力市場競爭中難以取得好的工作機會，雇主雇用的意願亦不高，且即使受雇，僱主願償付的薪資會較少。這造成不易取得足以因應生活所需的薪資而增加落入貧窮的風險 (Schiller, 1995)。再者，因為個人人力資本的多寡是受到個人投資選擇所致，因此，個人的貧窮風險與個人對資源的使用偏好有間接的關係。

假設二：家庭背景影響小孩的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累積，進而影響小孩未來的社會經濟地位

人力資本理論的第二個假設是有關家庭背景對於小孩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父母對於小孩的知識、技術、價值與嗜好有很深遠的影響。富有的父母不僅經濟資源夠、社會資源豐富、對小孩關注及鼓勵的時間也多，因此他們可以擔負較多的成本與擁有有效率的方法來培養小孩。故從小生長於此類家庭的小孩在教育取得與工作訓練等等的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投資較多，進而可取得較佳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反的，貧窮家庭中的小孩就沒有如此幸運，父母皆汲汲於家庭的生計問題，故父母對小孩的關注與鼓勵的時間較富有父母少，在經濟與社會資源亦較富有父母少，對在此一家庭成長的小孩之人力與非人力資本的累積，相對富有家庭的小孩而言是較不豐富的 (Becker, 1981; 1993)。因此，對家庭背景不佳的小孩而言，在未來社會經濟地位的競爭上是處於較不利的狀態，落入貧窮的風險或延續父母的目前社經地位的可能性都比較高 (Polachek & Siebert, 1993)。

假設三：家庭背景與個人的特質會影響個人收入與職業地位

而地位取得模式的假設與人力資本很相似，而且該論點研究重心也不是放在貧窮問題上。該論點主要源自 Blau & Duncan 於 1967 年開始的一連串相關研究，他們發現父親的職業對兒子目前的職業有直接的影響。且父親的教育與職業亦會透過對其兒子的教育與第一個工作而影響兒子的目前職業。

它所認為影響個人收入的因素有個人的教育、家庭背景、個人的智力與個人職業等幾項（許嘉猷, 1986）。因而，如把這個成就地位當做是為何會取得低所得地位的角度來看的話，那麼一個人之所以貧困，除了低的個人能力外（低教育與智力），個人成就動機不足，及家庭背景不佳都是潛在的影響變項。

二、限制與貢獻

上述二種論點的貢獻有二：一是提出家庭背景因素對於個人經濟社會地位有影響，且經濟地位的取得是種動態的現象，這二個看法對近來的貧窮動態的解釋有一定的啟蒙作用。一則是視教育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因素，教育在這二者中分別具有傳承與調節的功能，但二者都強調教育的調節功能大於傳承的功能（許嘉猷, 1986）。但在貧窮研究應用上，上述二個論點依然有其限制：

一是理論的假定與實際的市場狀況相距甚遠，這二個論點皆認為良好的能力（教育、工作經驗與技能），能表現出較高的生產力或生產效率，而得到好的報酬的回饋。但事實上只有在完全競爭的、開放的、同質的及理性的市場下，人力資本或個人特徵才會完全決定薪資的多寡。是故，這二個論點簡化了市場中的薪資決定因素，以為薪資只受勞方生產力所決定，而忽略了薪資決定過程中（勞雇雙方交易關係中）的不平等權力、統計歧視與市場結構因素。也就是說，其只著重在供給面，而忽略了需求面因素（產業與就業機會之結構特徵、就業機會的分配狀況及市場中就業歧視等等）對薪資的影響。例如：可能受選擇職業時的就業機會分配因素之影響，即使有二人的人力資本相當，但也會因就業機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薪資。

二則是兩個理論的討論焦點原非用以解釋貧窮的發生與代間流動。且貧窮的決定單位是家庭或家戶而非個人，這意謂一個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雖每個人成就地位不一樣，但貧與非貧的地位卻是家庭所有成員都一致的。⁶ 因此受理論的標的與理論重於個人層次的分析，使得他們在貧窮研究的適用上

6 在判定一個家戶是否是貧戶時，通常我們假設家庭資源是均分，所以每個人的生活自足能力皆是相等的。

有所侷限。

三對地位取得研究而言，早期地位取得的研究多使用橫斷性（Cross Section）或回憶性資料，而忽略了區分短期與長期貧窮，也低估了家庭背景對兒子經濟成就的影響力，或低估了父親與兒子所得間關係（Corcoran, 1995）。這因素是使得後續有關貧窮動態的研究甚少引用地位取得研究的成果的理由之一。

陸、雨露均霑論與勞力市場理論

在這一節中，我們所討論的貧窮理論，主要運用在對於貧窮數量的解釋。我們將介紹的理論有三，一是雨露均霑論，一是勞力市場理論，後者又分為新結構論與區域勞力市場理論兩類。

一、雨露均霑論

假設：經濟成長能有效的減低貧窮

Anderson (1964) 所著的 “*Trickling D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tent of Poverty among American Families*” 是雨露均霑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貧窮的發生率是對數中位所得的函數，經濟成長有助於減抑貧窮的發生，但隨著中位所得的增高，經濟成長效果呈先增後減的趨勢。雖然 Anderson 在文章中曾依不同群體分析經濟成長對他們的助益，但有關經濟成長對貧窮率減抑的機制卻所言不多。從後續的研究中，我們歸納出經濟的榮枯影響貧窮率高低的主要理由如下：因為如果經濟好，工作機會就多，勞力需求多，此時雇主較少會選擇他們所雇用的人，故貧窮者尤其是有工作能力的貧窮者就較容易找到好工作，進而脫離貧困（Kelso, 1994; Lyson et al., 1993）。而且經濟好，政府的稅收就多，會有較充分的資源來協助貧窮者，使貧窮者直接受益。或者政府（因為經濟好）做大量的公共投資，公共投資不僅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使窮人可以有機會取得；即使這些工作機會非窮人可以取得，但因為取得這些工作機會者的所得增加，而造成需求增加，產生為滿足這些需求的工作機會，讓窮

人有機會取得，而形成所謂乘數效應 (Multiplier Effects)；或者因為取得政府工作機會者，留下原有職位的空缺，使窮人可以取得這些空缺的工作機會，即所謂替代效應 (Substitution Effects)，助益窮人脫離貧困 (Schiller, 1995)。

但這個論點在經驗研究上卻得不到一致性的結論 (Lyson et al., 1993)，與現實狀況亦有不合，例如：Kelso (1994) 指出在 1980 年代雖然美國的經濟有好轉，但貧窮率卻不降反昇。這種矛盾等於指出所謂的雨露均霑過程僅是有益於已在工作的或有工作動機的貧窮者，對無工作動機及無工作者是無益的 (Kelso, 1994)。更進一步來說，在雨露均霑的過程中並非每一個人皆能受益，還需考慮原來貧窮者或近貧者的工作型態與能力，如果這些人原來的工作機會並不受經濟成長的影響，或成長的工作機會並不適合工作者的期望與能力，或成長的工作機會皆是低薪的與不穩定的工作，或工作者對於成長的工作機會沒有充分的訊息。則經濟即使成長也無助於區域貧窮率的減低 (Lyson et al., 1993)。再者，經濟成長雖可帶來所得的成長，但相同的亦可能形成薪資或家庭所得的不均度擴大，前者有助於減抑貧窮率，但後者卻會減抑所得成長的作用，而促使貧窮率的成長 (Gottschalk & Danziger, 1985; Danziger & Gottschalk, 1986; Sawhill, 1988; Blank, 1993; Smolensky et al., 1994; Blank & Card, 1993)。

另外，經驗研究指出，經濟成長與貧窮率之間的關係並非線性的，即使所得成長，且所得分配不均度與人口組成都不變的狀況下，經濟成長對貧窮率減抑的效應還是會呈遞減的現象 (Danziger & Gottschalk, 1986)。最後，經濟成長所具有的減抑貧窮率的效應會受到周期性的因素，如：失業率的影響，而降低其減抑貧窮數量的能力 (Sawhill, 1988)。

二、新結構論

假設：工作的報酬受到經濟組織特性所影響

新結構論可視為對地位取得與人力資本理論的一種反駁。該理論主要著眼於個人之外的結構因素對於個人成就的影響，他們認為勞力市場中工作報酬（與其它報酬）的多寡主要係受到社會經濟結構，如：職業特質、工業特

質、組織特性、勞力市場部門和階級特性的影響（許嘉猷, 1986）。

貧窮議題基本上並非這個理論所著重的主題，再者這個理論對於貧窮的解釋，事實上只是就現況歸納來與理論對照連結，並未有很明確的解釋貧窮的概念模型。即使如 Gordon (1972) 所著的「*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Orthodox, Radical, and Dual Labor Market Perspectives*」一書中，對貧窮的解釋之著墨亦不多。就理論性的陳述而言，Piore (1971) 對於雙元勞力市場理論的描述可作為新結構論解釋貧窮現象的代表性文字。Piore 認為：

「主要勞力市場提供具有下列特性的工作：高工資、良好的勞動環境、就業穩定性和工作安定性，工作規則的處理上是公平的和有適當的程序，及有昇遷的機會。……次要市場的工作，相對於主要部門的工作而言，是相當不吸引人的。他們傾於低工資、不良勞動環境、就業的變異性大，辛勞和專斷的訓練，與幾無昇遷的機會。窮人即被限制在次要勞力市場中」（Piore, 1971；原文取自 Gordon, 1972）。

在此我們只要把主要與次要勞力市場的標題與描述替換成其它型的分類，如：核心產業（Core Industry）與邊陲產業（Periphery Industry），或工作機會結構的品質優劣即可大致表明其它不同新結構論者對於貧窮的看法。不過在實際的經驗研究中，新結構論者研究的焦點多是放在某項工作組織結構與個人薪資或薪資率的關係，除少數例外的研究：如 Bloomquist & Summers (1982)，持這個理論的經驗研究是很少把焦點轉移至家戶的所得或貧窮研究上。

三、區域勞力市場理論

假設：經濟成長不一定有助於地區貧窮率的下降，端視地區產業、職業與工作性質的分配而定

如本文先前所論及的人力資本論者、地位取得論者與一些新結構論者

(如：Averitt, 1968; Hodson, 1983; Doeringer & Piore, 1971)，皆僅著重於跨空間脈絡的個人的能力或個人的能力、社會階級、職業、公司與產業等因素對於個人成就地位取得的影響。這裡用「著重」一詞是因為運用這些理論的經驗研究有時也會考慮結構因素，如：地位取得觀點中，個人居住地的結構因素對於個人成就地位取得亦有影響，但這些因素相對於個人因素而言是較次要的 (Tolbert, 1989)。這些論點認為勞動者與雇主的交易行為是在一個跨空間脈絡 (Spatial Context) 下進行的，交易的雙方可以為最大化他們的利益而自由移動。但在現實中，個人對於經濟與生活機會的取得，不僅受限於個人的家庭與社區的關係、知識、偏好、習慣與移動的能力，也受地方性勞力市場領域 (Local Labor Market Area) 中的就業數量、型態、薪資水準，及區域中經濟社會特徵如：人口組成、教育設施與文化特徵等因素的影響。易言之，因為勞力市場中的行為是發生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所以對勞力市場的運作與運作結果的討論也應考慮空間的限制 (Tickamyer, 1992; Tickamyer & Bokemeier, 1993)。

在貧窮的經驗研究上，已有部分的研究或多或少與上述的研究建議不謀而合，並從僅著重於個人的或結構的致貧因素，轉至論證個人特徵、經濟機會的空間分佈與區域社會經濟特徵等因素對於區域中貧窮數量的影響。例如：Bloomquist & Summers (1982) 研究「非都市社區家戶所得分配」與「產業部門的不同職業組成」的關係中發現，受雇於競爭產業 (Competitive Industries) 的居民比重增加與集中產業 (Concentrated Industries) 的居民比重下降，則社區中低於中位所得的家戶會增加，反之則降低。Tomaskovic-Devey (1988) 運用相似的論點，但不同的研究架構，結果發現區域的產業結構、勞工的相對力量、工作品質與工作數量是影響區域貧窮率的主要因素。Maume (1988) 的研究則指出區域勞力市場的結構影響婦女薪資的取得，即當政府對於區域的勞力與生產市場的投入愈大、區域的經濟力量愈大 (工作以輸出導向的產業為主) 則婦女的貧窮緩衝 (Poverty Buffer) 愈大。Wilson (1987) 的研究則指出區域經濟機會結構、人口結構與家庭結構的轉變是都市社區產生貧窮集中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這些研究中有的是受到新結構論的影響，單純討論地方勞力市場特徵對

家戶所得的影響，如：Bloomquist & Summers (1982)。有的則綜合各家理論，發展出經驗研究的架構，以討論個人特質、地方勞力市場與社會經濟特徵對貧窮數量的影響，如：Tickamyer (1992)、Tomaskovic-Devey (1988)。但不論理論的基礎為何，這些研究皆預設著居住的區域不同等於預訂人們將面臨不同的機會結構（即是地方勞力市場特徵與社會經濟特徵的加總），而機會結構可以強化或限制個人與家戶／家庭的特徵，影響人力資本的累積與投資報酬率、經濟與生活機會取得與最終的成就地位（Wilson, 1987; Tickamyer & Duncan, 1990; Tickamyer, 1992; Tickamyer & Latimer, 1993; Tickamyer & Bokemeier, 1993）。

此一預設與稍前我們所討論的雨露均霑論是相當不一樣的，相對於雨露均霑論，這些研究者認為區域的經濟成長並不一定有利於區域的居民。因為區域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新工作機會可能需要特別的能力，而這些能力是現處居民所沒有的，所以無法有利於原來的社區居民（Wilson, 1987）。再者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工作機會如是侷限在邊陲產業與次級部門，則會因為這些產業的工作是低薪與不穩定，而促使新的貧窮的發生（Tickamyer, 1990）。最後經濟成長對社區居民的福祉的影響也不限於經濟層面，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而且這些因素皆會影響區域貧窮數量的多寡（Wilson, 1987）。因此，納入區域特徵的貧窮研究也等於反駁雨露均霑論，並認為工作機會的成長雖然可能減低區域的貧窮數量，但還需考慮工作機會的分配適當與否，如果分配的並不適當或不合區域居民能力所能及，則反而不利於區域的貧窮數量的減抑。

四、限制與貢獻

上述的理論雖然已被運用在貧窮的研究之中，也影響後來 80 年代配誤論與 Wilson 的論點建構。然而，這些理論最大的限制在於其依然僅著重在市場中薪資取得的研究，而未考慮到家庭的生活資源其實是來自於不同的所得來源。再者，如新結構論或後來的區域勞動市場論點，這二個理論原來的理論意圖並非著重於貧窮的解析，這使得在經驗研究的運用上有所限制，例如：研究組織中不同職位者的薪資取得，雖是新結構論者研究的重點之一，但卻

很難運用至貧窮的研究之中。最後，這幾個理論對於貧窮動態的現象並沒有認知或這個議題是不被他們重視的，雖然我們可以推斷他們應會認為貧窮的數量與勞力市場的工作品質與數量的變化有關，但是到底勞力市場的工作品質與數量怎麼去影響一個家庭的致貧、持貧與脫貧的過程，卻很難從這些理論中去辨別出來。

柒、Mead 及 Murray 的觀點

貧窮文化的論點直到六〇年代晚期已逐漸式微，但到了七〇年代晚期，以文化來論述貧窮的看法又漸漸的興起。不過與前面貧窮文化不同的是，他們集中的討論焦點是底層階級（Underclass）此一新興社會現象，挑起這種論點的是一般報紙專欄作家，而在 Charles Murray, Lawrence Mead 與 George Gilder 等新保守主義人士的手下發揚光大。如同前期貧窮文化與情境觀點間的論戰一樣，文化派與以 William Julius Wilson 為主的結構派人士打論戰，筆論尤其集中在八〇年代晚期與九〇年代早期。因此，以下我們將先分就兩者對於貧窮的看法做討論，然後再討論他們之間的差異與前期論點的異同。

新保守主義對於貧窮的看法依然延續貧窮文化的角度，主要集中在貧民的偏差價值、態度與行為。他們認為貧民是被陷在（Trapped）偏差文化底下無法自拔的一群人。而且強調政府的福利措施是造成貧窮人口偏差行為、態度與價值的主因。不過在這之中新保守主義者對於福利與貧民偏差文化間的看法並不一致。其中一派是以 Mead 為首的福利文化派，強調福利的給予並未提供相對的社會義務回饋，造成接受福利者養成偏差的態度、行為與價值，而使得領受福利者沒有社會義務或工作倫理，寧願領福利而不想工作。另一則是以 Murray 為首的反工作誘因派，強調福利的供給太過寬大，使得接受福利給付者選擇領福利，而不工作。

一、Mead 的觀點

Mead 討論的核心是集中在（美國）領受福利者的行為問題。在他早期著

作中 (Mead, 1982) 認為福利方案的目的是為使「弱勢」(Disadvantaged) 群體整合入主流社會，但這些方案卻集中在這個群體之經濟面向問題改善，對參與主流社會應有的態度與技巧的要求卻不注重，這使得該群體產生一些與主流社會不同的偏差行為問題。他拒斥自由派學者所認為的，弱勢群體之行為問題是經濟環境限制所致，也不同意另一派保守主義者所認為的，是福利給付所形成的經濟誘因所致，相反地他認為弱勢群體的行為問題，肇因於社會福利方案僅給予申請者福利，但卻沒有明確的要求他們需要回饋的義務 (Obligation)。因此，他主張唯有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福利方案才得以解決弱勢群體的行為問題。在稍後的幾年中，Mead 的討論其實不出上述的範圍，他最主要關注點依然放在福利制度、工作與新貧窮三者關係上，討論貧窮的持續與福利依賴的問題。

Mead 認為不工作或工作時數太低是形成新貧窮 (不工作的窮人) 的主因 (Mead, 1988; 1992)。他反駁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經濟條件的轉變造成低技術工人的工作不易尋找的理由，也不支持 Wilson 與 Kasarda 所主張的配誤論，他覺得對於低技術的工人而言工作還是足夠的，只是品質不是很好罷了 (Mead, 1988)。因此，他認為如果低所得男性與福利母親能夠規律的工作，則底層階級應該就會消失不見 (Mead, 1986)。但是既然工作足夠，且努力工作是貧民或貧戶的脫貧之道，那麼這些有能力工作的窮人為何不工作呢？Mead 認為不工作的心理因素的可能解釋有三 (Mead, 1993)：

第一個解釋是窮人雖想工作，但他們要的是好工作與能成功的工作——即工作的薪資與一般大眾無異——而非那些不好的工作。其次，經濟上的宿命 (Economic Fatalism) 心態，這個心態之起因部份是因黑人在奴隸時期的集體記憶與 Jim Crow 法案所共同形塑的被動與無望的失敗主義心態 (Mead, 1993; 1992)，部分則是這些依賴福利的美國人多是來自於非西方文化的國家移民，在這些文化中成長的人很容易接受環境所限，而不是克服環境困難。最後一個解釋，也是 Mead 認為最有可能的解釋則是所謂的貧窮文化，⁷ 對窮人而言，工作雖是他們所喜歡做的，但他們不覺得應不計任何成本

7 筆者對 Mead 所言的貧窮文化有點感到困惑，Mead (1994:336) 認為貧窮者有正統的價值

的去工作，因此工作對他們而言是期望而非義務。那麼為何會引致今日的貧窮人口有如此的文化或態度呢，與社會福利制度又有何關係呢？

其原因除了他們與主流社會隔絕之外，以往的機會均等計劃中未告訴窮人，工作是值得做的觀念亦有關（Mead, 1991），這造成很多有工作能力的窮人自願的放棄可得的工作機會（Mead, 1986）。另外，以往的福利給付太過於寬大（Permissive），而無權威性（Authoritative），只顧給福利而不要求領受者回饋，該一缺乏責信（Accountability）的制度使得這些領福利者產生依賴心態或強化了他們的偏差行爲，這也是爲什麼領有福利者的不工作、犯罪、家庭破碎與其它問題會比一般人多的原因（Mead, 1986; 1987）。那麼如何解決依賴政府及不知應回饋任何社會義務的福利文化呢？

在 Mead 的眼中「新貧窮」係根源於心理、文化與人性，而非其它保守派人士所認爲的福利政策的反工作誘因，或自由派所持的機會結構限制所致（Mead, 1992）。是故他主張社會政策應該轉向，多著重於動機與秩序議題，而非機會均等的議題（Mead, 1991），應以權威性社會政策取代以往過於寬大的社會政策，以增加窮人特別是福利依賴者的社會義務（Mead, 1986）。爲何要如此做呢？因爲政府是唯一有強大與合法的力量來限制及增強窮人盡社會義務的機制，且如同政府有責任維護經濟繁榮或以國防力量來保護國民的責任一樣，政府亦應扮演父母般的角色，教導其國民如何做個盡責的好國民。換言之，既然這些窮人的社會責任感很低，甚至無盡社會義務的意願，那麼政府的福利政策就應該改善這種情況，增進（強迫）窮人盡公民應有之社會義務（Mead, 1986）。

而在福利政策建議上 Mead 以爲「強制工作」（Workfare）是一個有助於不工作窮人改善工作意願的作法，即在領受福利的同時亦需要有責任做工作或尋找工作以滿足回饋義務之要求（Mead, 1993; Wilson & Mead, 1987）。總之，如能使工作被視爲一種公共的義務，如同納稅與法律一樣是被

（Orthodox Values）但卻無法依循該價值。成年貧窮者想要履行工作倫理与其它主流規範，但因理解週遭環境的限制，而感到無法去真正的履行。這種看法與貧窮文化論點的主張並不盡相同，反而更相似於情境觀點。但在 Mead 的文章中都是使用 Culture of Poverty 一詞，爲尊重原著者，在本文中我們還是視 Mead 的主張是依循貧窮文化論點，而非情境觀點。

每個人遵從不悖 (Mead, 1986)，則可以解決窮人之福利依賴與其它的偏差行為。

二、Murray 的觀點

Murray 視政府的福利措施是 1970 年代起潛在貧窮 (Latent Poverty) 增加之主因，他拒斥經濟發展會產生減抑貧窮人口的想法 (即雨露均霑論)，而認為福利的給付會去除低所得者的工作倫理，創造反工作的誘因 (Work Disincentives)。使得人們對從事低薪工作的意願減低，而傾向於依賴政府的救助 (Murray, 1982; 1984)。

美國 1960 年代的福利改革，放寬了福利的受益資格，此作為促使低所得中有工作能力者停留在勞力市場的意願降低，以致勞動參與率下降、年輕工作人口失業率增加 (Murray, 1982; 1984)。這種社會政策的改變不僅改變了窮人的勞力市場行為 (勞動參與率、年輕勞動者之失業率)，還誘使與影響低所得者的其它行為，如家庭行為 (單親家庭或家庭組成的改變、未婚生子比率)、犯罪行為 (Murray, 1984)。以家庭組成的改變來說，在 Murray (1982) 較早的文章中，僅把福利政策改變所帶來的誘因變化視為是家庭組成改變的部分因素。但在 Murray 1984 年所著的 “*Losing Ground*” 一書中已視為主要的因素。他以一對虛擬的配偶 Phyllis 與 Harold 當做例子來說明：

Murray 假設這二個人的父母都是低所得者，無力支持他們生活，而二人都是高中生沒有升學意願與特殊的才能，且 Phyllis 已經懷孕了等等狀況。Murray 認為如果是在 1960 年代，因為 AFDC 給付條件使得 Harold 無論是否與 Phyllis 結婚，都需工作以過活；而 Phyllis 雖可不用工作就得到 AFDC，但卻會失去 Harold。因此 Phyllis 結婚與否是基於非經濟的動機及有合法的機會得到 Harold 的經濟支持扶養小孩等二個條件。不過 1970 年代起 AFDC 給付條件改變了，1960 年代的 Harold 會因為兩人不得同住、領的錢太少且無法支持他等理由，而反對 Phyllis 去領 AFDC。這些不利條件在 1970 年代都被去除了。現在 Harold 有無工作收入皆不影響 Phyllis 領受 AFDC 給付的資格，並且也不需與 Phyllis 分居。從經濟的動機來說結婚是有點愚蠢的；從非經濟性的動機來說，Harold 如果想有一天他可會厭倦當父

親或不喜歡 Phyllis，則 1970 年代的 AFDC 規定會誘使他保持不與 Phyllis 結婚。對於 Phyllis 而言，在 1970 年代如與 Harold 結婚，則將使她無法領 AFDC，並且減低其財務自主性，況且 Harold 的工作也不如福利來的穩定。因此，在「生小孩可以給他經濟保險，但有丈夫卻什麼也沒有保障」的狀況下，Phyllis 將傾向選擇不結婚 (Murray, 1984)。

是以就 Murray 而言，Harold 與 Phyllis 在 1970 年代會較 1960 年代的結婚意願低，這種行為的改變，則是因為 AFDC 規定改變所致。Murray 把福利或社會政策視為得以左右低所得者行為的誘因（報酬與處罰或稱蘿蔔與棒子），他認為貧民與一般人一樣都是精打細算的「理性經濟人」，Harold 與 Phyllis 的故事說明了政策（環境）改變了對於婚姻與擁有小孩經濟價值的評量，價值的評量（經濟的誘因）又影響了他們的行為，但不變的是以生活品質最大化或經濟利益最大化做為行為方向與決策的判準。相同的，社會政策的改變，亦影響了低所得人口的反社會行為與勞力市場行為。除此之外，Murray 基本上也接受貧窮文化的觀點，認為窮人受限於籌碼有限和不耐等待較久以後的結果，並且以最大化短期所獲為依歸 (Murray, 1984)。

基於前述，因福利的給付過於寬大，斬喪了人們自己自足的意願，促使人們的行為傾向於受短期經濟誘因的誘導，而有依賴福利不願脫離貧困的現象 (Murray, 1984)。Murray 解決福利依賴或貧窮之道為去除福利誘因，因為誘因變了行為也會跟著改變，且強調福利制度應著重處罰或棒子的性質，大於報酬與蘿蔔的性質。於是他建議美國政府應縮小福利這塊經濟大餅，使得私人、市場與家庭再度發揮他們的功能解決貧困問題。他的主張深受雷根政府的支持，因為這正好可做為政府削減福利預算的權威性理由 (Katz, 1989)。

三、限制與貢獻

Mead 與 Murray 兩人最大的貢獻，是促使了貧窮研究者更深一層地去省思政府福利政策的非預期結果。他們認為原本福利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與減輕貧窮問題，但福利政策施行的結果卻可能造成領受福利者喪失自立自助的意願，進而長期處於貧窮之中無法自拔。因此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從政

府的福利政策著手處理貧窮問題，Mead 的解方是建構大政府，強調以國家強制力量來解決貧窮問題，Murray 則是認為政府的功能愈小愈好，強調自由市場的力量可以解決新貧窮問題。Murray 的論點基本上並無新意，Jencks (1992) 更直言 Murray 所說的論點都沒有什麼事實的根據。在經驗研究上 Murray 的論點亦未受到支持 (Eggers & Massey, 1991、1992)，更糟糕的是八〇年代雷根與布希政府的福利縮減措施並未明顯的造成美國貧窮率的下降，這使得 Murray 的觀點說法值得再商榷。

至於 Mead 的論點由於概念操作化困難的限制，在經驗研究上不多見，亦尚未有定論。然而不論 Mead 的論點是否完全正確，他的說法卻引發了其它層面的討論，尤其是關於福利政策目的的討論。福利政策的施行通常含有經濟與道德等二項目的，Mead 的貧窮解方有別於其它理論者，他相當著重於福利政策在道德面向上的目的。他認為不論什麼工作都是值得做的，以工作自助自立不僅符合美國的價值與大多數人的經驗，亦是一個公民應有的社會義務，故僅有盡到此義務的公民才能更進一步要求政府或社會提供新的經濟權利 (Wilson & Mead, 1987; Mead, 1988)。在這種觀念下 Mead 提出「強制工作」方案，他認為這種方案可矯治領受福利者自願不工作的不道德行為，並使得權利與義務相符的普同社會價值得以被維護。

然而，這種深受權力／中產階級道德所左右的政策，脫離不了責難窮人處境的意味。再者，以國家來執行這帶有深深道德期許的方案，不僅可能付出破壞「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中道德機制的危險，也可能無法真的「矯正」富高度個人意願所決定的道德行為 (王篤強, 1998)。最後，Mead 預設窮人有心理上的缺陷，故產生自願不工作與依賴福利的行為，這種偏差的心理非得經由強迫性的福利才得以矯正。但事實上，Mead 所指陳的種種造成窮人心理缺陷的原因及窮人的心理缺陷皆帶有誤解歷史、扭曲經驗研究，甚至是無經驗的證據佐證的成份存在 (Katz, 1992)。上述的限制，使得他的說法與 Murray 的觀點一樣引起相當大的議論，兩者皆成爲後來自由派學者極力反駁的對象。

捌、Wilson 的觀點(包含配誤論)

八〇年代早期對於底層階級或貧窮的討論，基本上都集中於新保守主義者的論點，甚至是由他們所主導。相對的自由主義者在這一方面的論述卻不多。但至八〇年代晚期，尤其是 Wilson 出版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一書後，這兩個領域的對話開始出現，而且論戰一直延續至九〇年代還方興未艾。Wilson 及其同僚的說法，基本上是反駁 Mead 所言的工作倫理喪失與社會義務缺乏的說法，同樣的也反對 Murray 所言經濟誘因決定了貧民的行為。以下我們將就 Wilson 的論點做整理討論，並於最後一段中檢討 Wilson 觀點的貢獻與限制。

一、Wilson 的觀點

近來以結構性取向解釋貧窮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過於 William Julius Wilson。他企圖去理解為何美國都市居住區之社會失序 (Social Dislocation) 問題會如此嚴重。在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一書中，他反駁傳統自由主義者與新保守主義者對於都市社會失序問題的理解取向。Wilson 認為社會失序的問題不能僅單純以歧視或貧窮文化來解釋，這些問題有其社會學的先決條件，範圍包括人口變遷與經濟組織變遷的問題。他試圖以社會的 (Societal)、人口的 (Demographic) 與鄰里的 (Neighborhood) 等內在相關的變項來解釋種族間社會失序率差異的變化。這些變項構築成：工作機會結構的改變、選擇性人口遷出與集中化效應等三個假設，Wilson 以他們來解釋美國都市居住區的社會失序 (暴力犯罪、非婚生子女、女性單親家庭與福利依賴) 現象 (Wilson, 1987)。如同 Mead, Murray 一樣，Wilson 討論的問題不僅限於貧窮問題。再者，其討論的焦點則侷限在都市的黑人居住區或黑人底層階級。但因他所架構出的理論假設，已被廣泛的運用並影響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對於貧窮的解釋。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將他的論述納入討論，且

以他在 1987 年所出版的都市內城底層階級討論專書中的論點為主軸，輔以其後的一些文章，以對他的理論做描述整理。

要點一：人口流動、移民政策與公共住宅計劃對都市底層階級的影響

Wilson 認為黑人集中於都市內城是有其歷史的根由，因為早期美國禁止來自歐洲與亞洲的移民，但對於黑人在美國境內的流動卻無限制，這不僅使白人對於黑人歧視的增加，也使低所得的黑人大量集中於都市中心 (Wilson, 1987)。當這種移民政策廢除後，有二種力量使得這些黑人社區的社會失序現象大增：

第一個力量是都市中的黑人階級（工作與中產階級）的選擇性移出，這個現象有三種後續的效應：1. 由於部分黑人經濟能力提昇足以負擔貧民區以外的住宅費用、法律的改變（如：反歧視法）和居住歧視下降等因素，使部分黑人得以離開貧民區至其它地方（如：都市郊區）就業與居住 (Mincy, 1994)。這使得留於居住區的黑人多屬處於不利地位者，此一人口組成的轉變促使內城的社區產生貧窮集中化 (Poverty Concentration) 現象 (Wilson, 1987)。2. 中產與工作階級，父母、朋友、團體與地方組織皆具有經濟緩衝 (Economic Buffer) 的性質，例如：能使陷於經濟困境的家庭免於依賴福利 (Wacquant & Wilson, 1993)。因此，當這些功能減退時，都市社區的依賴福利行為就會增長。3. Wilson 也認為中產與工作階級是社區的結構資源 (Structural Resources)，有社會緩衝 (Social Buffer) 的性質，具有緩和無業者成長所引致的負面效應；它亦是社區的文化資源 (Culture Resources)，是社區兒童學習傳統角色模式的代表人物。但在他們移出都市社區後，這些機制功能減低，並惡化不平等經濟成長與經濟不景氣所引致的無業問題，這些因素一起形塑「集中化效應」影響都市社區中的社會脫序行為 (Wilson, 1987; 1991; 1993)。

第二種力量則是公共住宅計劃的影響，他引用 Roncek 的說法，當大量的窮人家庭因高密度的住宅計劃而安置於同一居住區時，高犯罪率、家庭解組與暴力行為因這些計劃而興盛。在這種公共住宅區或內城區，居民很難認定鄰居。以致守望相助行為減少，居民對區域中的事務亦不關心，加上失業與失學的青少年增加，使得這些內城社區成為犯罪的淵藪 (Wilson, 1987)。

要點二：都市經濟結構改變對都市黑人底層階級的影響

經濟結構的轉變是 Wilson (1987) 論述的主軸，在此他參考 John Kasarda 配誤論與 Frank Levy 的說法，提出如下幾個次假設來說明經濟結構轉變對於都市底層階級中無業者增加現象的影響。首先，由於都市中心（特別是美國北方的大城市）正從生產與物資分配中心轉成管理、訊息交換與高階服務提供的中心。這種經濟結構的變遷改變了都市內城的就業機會結構，以往僅需低教育與技術的工作機會減少，新增的工作機會則是要求較高的教育水平與技術。這種因內城中的黑人技術能力與教育程度不契合新增工作的就業要求，致使無法取得適當的工作的現象一般被為「技術配誤」(Skills Mismatch) (Kasarda, 1983; 1988; 1993; Wilson, 1987)。再者，雖然在美國的低技術工作數量是增加的，但這些初級與低教育要求的工作機會增長多是位於非都市地區，相對上都市中心裡適合低技術低教育者的工作機會卻持續減少；且即使這些工作能力不佳的居民想去都市郊區工作，但受限於私人交通工具的缺乏，或工作尋找與交通成本的增加，造成他們不易取得這些穩定的工作；此一現象即我們一般所稱的勞力供需的「空間配誤」(Spatial Mismatch) (Kasarda, 1983; 1988; 1993; Wilson, 1987)。第三，因為黑人多受僱於製造業或藍領工作，這種產業特別容易受到經濟成長遲滯 (Slack Economy) 的影響，石油危機使得政策制定者以大量失業來解決通貨膨脹的效應，再加上婦女勞參率增加、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達到就業年齡，產生勞力過剩的環境 (Labor Surplus Environment)。這大批的勞力使得雇主可以選擇他們所想要的人，黑人由於教育與技術能力不足，致使他們在職業取得的競爭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Wilson, 1987; Wilson & Mead, 1987)。

上述三種因素造成黑人，特別是年輕黑人的無業率 (Joblessness) (失業與未進入勞力市場的勞動力) 比重增加。無業率增加帶來三種效應，一是使留在都市內城社區的黑人容易落入貧窮，與選擇性階級移出內城一樣，使得社區產生貧窮集中化的現象 (Wilson, 1987)。二是結合高的黑人男性死亡率與下獄率，使得女性不易找到合適的對象結婚，造成單親母親與女性戶長家庭上昇。而單親女性戶長家庭又比其它類型家庭更易落入貧窮 (Wilson & Neckerman, 1987)，因此黑人男性無業率的上昇透過對於家庭組成的影響，

促使都市內城黑人社區的貧窮人口增加。三，與中產與工作階級移出一起形塑集中化效應 (Concentration Effects)。

要點三：集中化效應

如前所述，在 Wilson 的眼中 (Wilson, 1987)，工作與中產階級是黑人社區的結構資源，具有社會與經濟緩衝的性質，能幫助社區居民抵抗無業者成長的負面效應；它也是社區的文化資源，是維持社區中具社會化功能的基礎社會制度的人，這些都有助於社區居民特別是兒童，學習主流社會之行爲模式、規範與價值的途徑與角色模範。因此，他以爲在這些都市社區中即使面臨到經濟結構的轉變，但如果仍有不同階級者同住一區，社區中的基礎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商店、休閒設施等等亦功能正常，則不僅有助於都市內城社區居民紓緩經濟的困境，且能提供生活方式的可能選擇。

可惜中產與工作階級的移出，不僅去除了行爲與角色的模範，也惡化了社區中的其它具社會化功能的機構，都市社區於是成爲一個社會孤立 (Social Isolation) 的 (次文化) 區域。這類社區不僅無法因應經濟轉變所帶來的種種後果，更使得經濟轉變的種種後果對社區的居民的傷害更快速與加劇。Wilson (1991) 以「集中化效應」一詞來指稱此兩者所共同形塑的生活情境對內城居民 (特別是高貧窮率社區的黑人) 的影響過程及後果。

在這類社區中有許多內在相關的特徵，如：1. 與傳統的角色模範和非正式的主流社會網絡的接觸缺乏：因爲具社會化功能的社會機構功能不彰或品質不良，如：無法進入品質好的學校、破碎的家庭形態；而且缺乏與穩定工作與行爲正常的人互動，接觸的人多是品性不良與行爲偏差者；2. 適當工作缺乏，與工作訊息網絡 (非正式工作網路) 連結薄弱；3. 男性很少有穩定的工作，致使女性沒有可靠的對象可嫁。這對於社區的居民，特別是兒童的影響很大，因爲在此生活並無法與代表主流社會價值、行爲的人及機構互動，因而學不到主流社會的行爲、規範、與價值，如：教育與工作的意義，也限制了他們對於生活方式的認知，如：穩定就業是依賴福利的另一種選擇。加上工作期望不高、工作缺乏及與工作訊息網路連結薄弱，使得社區居民的競爭力下降難找到正常工作。在這種生活環境的限制下，都市內城的居民不得不轉向依賴其它不良的行爲與角色典範過活，如：成爲犯罪、依賴福利、不合

法工作者。這種因為生活情境的限制而去選擇不符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不僅未使原本的問題減輕，反而使得都市社區中的社會問題與貧窮叢生，居民的不利地位無法改善 (Wilson, 1993)。

因此，為去除這些問題，在政策上應該自問題發生的結構原因下手，經濟、社會與稅制政策皆需改變來因應上述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把社會與經濟帶回福利的爭論上，不應如新保守主義者僅著重於以個人或道德的方式來解決福利依賴、失序行為與貧窮的問題 (Wacquant & Wilson, 1989)。

二、Wilson 觀點的補充

Wilson 出版了討論美國都市內城中底層階級的論述專書後，有許多實證研究檢測其論點。但由於該書的寫作、說明與論點過於複雜，於是在出版後，Wilson 又斷斷續續 (Wilson; 1991; 1993; Wacquant & Wilson, 1989, 1993) 的一再說明他在該書中的論點「實際上為何，應怎麼看待，別誤解了」。但似乎愈描愈黑，他自己的歸納說明依然不很清晰，對於他所使用的概念間的關係也無法做很仔細的連結，甚至說法有前後矛盾的現象。在前一節中我們已把這些討論的部分「結果」納入，以下我們將就 Wilson 在 1987 年之後，他或與其它同僚合作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新概念」在做整理，期能更理解他的理論。

Wilson 與其同僚後續的研究，主要在澄清先前所談的都市貧窮集中化後果的特徵，這些說明主要如下：

一、他們引用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 凝聚的團體、網絡或組織—— 述說都市貧窮集中區促使居於其間的個人的社會資本失去或貶值。社會資本的形成是透過人與人或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而來的，例如：伴侶、朋友、親屬、地方組織等，它具有提供人們實現特定目標 (如：向上的流動) 的便利性。但貧窮集中化後使得這些構成元素變少與變的品質不佳，進而影響居於其間的人社會資本的累積與經濟穩定進步的可能 (Wacquant & Wilson, 1993)。

二、社區中的一些機構如：銀行、商店、教堂、休閒設施與社區團體等等的主要支持者是來自於具有穩定工作的家庭，當中產與工作家庭移出後，

上述社區機構的功能下降，這弱化了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促使犯罪與街頭暴力的增加，加劇惡化社區的居住環境 (Wacquant & Wilson, 1989)。也促使社區提供經濟服務的機構減少或服務意願減低，這種經濟與財政資本退縮，使居於此的人對於經濟、社會等困境的對應能力減少 (Wacquant & Wilson, 1993)。

三、因學校學生的組成多是低階級的兒童，累積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降低，這些低成就的學生影響老師的士氣與訓練要求，也弱化了工作與教育之間的關係，進而降低了學業期望。社區對於學校的支持少，也不重視教育的成就。這些都使得學校原有的功能與教育的過程變質 (Wacquant & Wilson, 1989)，而不能提供該區學子對抗外來的引誘。

四、工作管道的減縮，使得該社區的青少年投入犯罪者多。在週遭的人都是如此時，他們對於工作的意願便會下降，認知也改變，依賴社區條件限制下的生活方式就成了主要的未來選擇。這種偏離傳統社會認知的改變，對未來沒有理性的計劃、個人的熱情與向上流動的期望，促使著社區的生活方式更孤立於主流社會，不良的後果也就再循環至下一代身上 (Wacquant & Wilson, 1989)。

從這些補充性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比先前的說明更嚴謹，論述的焦點依然集中於經濟、人口與社會變遷對都市居民的影響。但缺點是，Wilson 對理論構念間的相互關連與運作機制，依然交待的不很清楚。

三、限制與貢獻

Wilson 論點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整合以往貧窮理論及相關的理論要點，用以解釋八〇年代美國都市中社會失序的現象。例如：他在解釋「社會孤立」的形成時，除了運用情境觀點中有關偏差行爲的形成是受到情境環境限制所致的概念外，他還將貧窮文化理論中有關家庭與社區對於兒童與居民影響的觀點帶入。而且爲了反駁保守派人士對於窮人自願性不工作的疑問，他引用了新結構論、地方勞力市場理論與配誤理論來說明窮人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爲工作機會與能力有限造成他們無能爲力。再者，就經驗研究的結果而言，Wilson 所提出的核心假設與解釋的問題除男性無業率與婚姻的關係很少受

支持外，其它的皆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Mincy, 1994）。可見相較於保守派的二位大將 Mead 與 Murray, Wilson 無論在理論架構與經驗研究上的佐證顯得更完備可信。

雖然 Wilson 的理論被廣泛的引用，亦得到很多經驗研究的支持，但依然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存在（Kelso, 1994）：一、Wilson 所描述的破碎家庭（尤其是指女性單親家庭）、犯罪率與無業率的大增現象，皆發生於都市產業與職業轉變之前。Wilson 卻未對此加以說明，這使得我們有理由質疑所謂經濟結構轉變與社會失序之間的關係，並不如 Wilson 所言的那麼密切，甚至他們之間可能僅是虛假的關係。二、他說都市中產業與中產階級的外移純為商業的考量所致，由於此使得都市的失序現象惡化。但事實上，產業與中產階級的轉移亦可能是都市內城失序現象惡化所致，換言之，兩者中何為因，何為果，依然是未定論。三、順著第二點來說，都市黑人所經驗到的社會孤立、高無業率等困境，可能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結構轉變所致，都市中的工作條件變差與文化道德的敗壞亦是造成都市黑人困境的原始因素。第四，Wilson 說經濟景氣不佳與經濟結構轉變不可避免的造成都市社區中的社會孤立與集中化效應，但問題是為何只有黑人或黑人社區才有類似的景況，而其它的少數民族，如：日本人、中國人社區卻未有如此的現象產生。第五，Wilson 忽略了都市內城的黑人所遭遇的困境，僅是反映整個社會的大趨勢而已，並非單獨存在的。第六，Wilson 所指稱勞力供需配誤現象僅能應用在美國中西部及東北部較大與老的工業都市，但卻無法解釋 1970 代晚期及 1980 年代經濟經濟波動對貧窮率的影響是因為工作分散至效區所致，及為何在經濟結構轉變下，都會區的貧窮率大幅上昇，但中心都市的貧窮率卻僅有小幅的成長的現象。

總之，雖然 Wilson 的理論有上述缺點存在，但相較於其它理論，其理論架構已較為完備，在經驗研究的支持度上亦較高，尤其是他整合各類理論的企圖心與創見，除引發大量的研究來檢證其說法外，更為解析貧窮問題找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與議題，此應是該理論最大的貢獻之一。

玖、結論：理論的定位、關係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第三節至第八節中，我們依各種貧窮理論的發展時間順序，整理各個理論的說法。在本節中我們除了為這些理論做定位外，並將對理論的相關性與政策意涵做簡短的總結，最後並由此說明可能的理論發展方向。

一、理論的定位

誠如本文前言中所言，筆者認為對於貧窮解釋的觀點大致可分為：缺乏、限制與選擇等三大面向。但事實上每一種理論多少含涉這三個面向，只是著重點不同，在表 1 中我們整理出各論點的分類。

貧窮文化論點可說是最早的貧窮理論，後續理論多少是建築在修正或批判它而成立的。該論點的主要提倡者 Oscar Lewis 雖主要關懷個人或家庭的認知偏差對於貧窮持續的影響，但當他在討論貧窮文化的發生，及他晚期與 Charles A. Valentine 等人的辯論中，都指出社會結構的因素對於貧窮文化持續的重要性。不過多數後續的研究者多僅著重在前者。因此，貧窮文化的論點可以歸類為以「缺乏取向」為主要取向的貧窮理論。而情境觀點則與貧窮文化相反是著重於情境結構的限制對於貧民行為的影響，因此它是一種「限制取向」的貧窮理論。兩者主旨雖皆是討論貧窮的後果，但我們可以推想而知，貧窮文化對於脫貧的解釋是需要改變貧民的偏差價值與態度，而情境觀點則是認為應改變結構的限制才能使貧民脫離目前所處的困境。至於在致貧上，情境觀點並沒有特別的解釋，而貧窮文化論點則可自其論點中有關「貧窮文化自我延續的特性」這一個假設得知，該理論主張致貧因素是個人缺乏一般大眾的信念、態度與價值下，自我選擇的結果。

至於人力資本論與地位取得模式則是「缺乏取向」的理論觀點。對於致貧、持貧與脫貧的解釋與相關的政策皆僅著重於一個焦點，即個人或家庭能力缺乏的多寡與改善上。由於個人與家庭「賺錢能力」與貧窮的風險成正相

關，故政策上應著重於改善能力缺乏部分。⁸ 至於雨露均霑論或之後的勞力市場理論皆可視為「限制的觀點」，雖然他們對於結構限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不過除雨露均霑論外，勞力市場理論雖然原旨上是討論機會結構限制對於個人或家庭資源取得（尤其是薪資）的影響，但不論在理論與其經驗研究中亦未忽略個人與家庭能力缺乏這一個要素。只是相對於機會結構的限制，個人與家庭能力的缺乏因素是比較次要的罷了。

然而，在貧窮的經驗研究中，勞力市場的理論居多被運用在解釋區域貧窮數量的問題，該論點主張經濟的機會結構的良莠與貧窮數量的多寡成正相關，欲解決貧窮問題需先從經濟機會結構改善起。由此我們亦可推想而知，該論點對於貧窮數量的動態變化主張亦是相同。但相對於雨露均霑論論者與批評者所提出的：經濟成長對於貧窮率的減抑的效應會隨所得成長而遞減，不同人口對於經濟成長的受益不同等假設；勞力市場理論在貧窮數量變化的動態解釋上就顯得比較靜態與單向，未能明確地指出到底經濟結構條件的改善與貧窮數量變化間的關係轉折點在何處。

Mead 的理論雖著重於公共權威的限制，但他亦未忽略個人的選擇與缺乏。他認為由於社會的權威與公共的權威等強制性 (Enforcement) 力量的缺乏，使得有工作能力的貧窮者缺乏回饋的責任感而少有意願去工作。再者窮人本身缺乏對於環境與工作的正確認知，也是促使他們寧願選擇不工作而依賴福利 (Mead, 1994)。因而在脫貧的解釋上，Mead 比較強調加強正式與非正式的強迫機制，也認為如果能創造一個有利於貧窮者遵循的好行為規範與價值，並配合上一個良好的賞罰體制，才有助於公民感薄弱的不工作窮人改變態度，且努力去工作，甚至是脫離貧窮。由此看來 Mead 對於個體貧窮動態的解釋，是比較著重在持續貧窮與脫貧的解釋，但對於致貧的解釋則無太多的陳述。而對總體貧窮動態的解釋，Mead 雖未確切的言明，但我們從他的論述中可知，不工作窮人比重與社會福利制度強化有工作能力窮人的責任心

8 Harris (1993) 的研究指出有完成高中學業的單親母親，較易找到穩定的工作而能更快速的脫離（領受）福利。因此 Harris 建議對單親母親的人力資本投資很重要，且對教育投資比對工作經驗的投資報酬率更高。

的強度大小有關。但後者在經驗上卻是很難去論斷與衡量的，也難理出一個明確的函數關係。

如同 Mead 一樣，Murray 的論點包含了「選擇」與「限制」的論述。他認為福利給付能改變經濟誘因大餅，這塊大餅是左右窮人行爲的主要理由。換言之，窮人的行爲是經由理性計算所展現出來的結果。故在個體貧窮動態三個階段的討論中，雖然 Murray 是集中於福利依賴或長期貧窮的問題，但由於其論點較為單向，所以我們可以推論，Murray 對於個體貧窮動態三階段的看法是一致的，致貧與持續貧窮是經濟誘因所致，要脫貧只要減抑這種誘因即可。而對於總體貧窮動態則與 Mead 論點一樣有相同的限制。

最後，Wilson 理論雖不否認 Mead 與 Murray 所提出的社會問題（犯罪、福利依賴、高失業……等等）。只是他認為這些問題都只是反應社會與經濟變遷兩者交互作用下的後果，雖然他也承認底層階級者本身在人格與行爲上是異於常人，但這是為適應他們所處的當下環境所引用的因應之道罷了，只要把這些限制去除，機會補足，底層階級的人所表現出的各樣脫序現象就會有改善。所以他的理論定位應是以「限制」為主的取向。再者，雖 Wilson 並未直接言明他對於個體與結構貧窮動態的看法為何。但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貧窮人口數量的增加與經濟機會結構的改變有莫大的關係，而經濟結構轉變與相伴而來的都市社區社會組織、家庭結構的轉變與文化特徵的變異，則是造成居民不利地位持續與代間移轉的主因。是故在政策上必須首重於因應經濟機會結構的轉變才可能減抑後續的不良後果。

二、理論間的關係

從理論的假設來看，我們可以查知八〇年代的三種理論與八〇年代之前的理論有很神似的地方。就機會結構的改變而言，我們可以發現 Wilson 論述與勞力市場理論及情境觀點皆有極為相似的論述。例如：Wilson、勞力市場理論皆認為工作機會結構的好壞會影響區域貧窮率的高低。而就差異面來談，Wilson 與勞力市場理論的說法之不同處在於 Wilson 強調產業結構的轉型所提供出來的新工作機會是不佳的，無法與地區內的勞動力人口的能力相配合，且轉型後的工作機會性質與未轉型前的工作機會性質相當不同，不足

以提供安定與穩當的薪資與昇遷。如果說上述 Wilson 的看法是比較動態的觀點，那麼勞力市場的說法則是比較靜態的觀點，或者只是提供 Wilson 進一步說明為何次級勞力市場的工作性質不佳，且會影響薪資所得的理論基礎罷了。

就偏差行為上面，Wilson 的社會孤立假設、Murray 的反工作誘因假設及 Mead 對於不工作者增多的解釋，皆與貧窮文化與情境觀點有很類似的部分。Wilson 的孤立假設與情境觀點很類似，但比起情境觀點，Wilson 的論點不僅更精密，且因指出孤立文化的形成原因，所以是更具說服力的論述。Mead 與 Murray 的觀點雖與貧窮文化分享了某些理論假定，但他們著重於「政府政策」對貧民的影響卻是貧窮文化論者所未提及。

就理論的相似性而言，Murray、Mead 與 Wilson 之間所處理的問題與觀點其實有共通之處。以 Murray 與 Wilson 兩人而言，他們都注意到社區的特性對於底層階級形成的影響，如：社區中有無適當的角色模範將是影響社區小孩行為與後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再者，他們同樣也注意到家庭結構對於小孩的不良影響與終生後果 (Murray, 1996; Wilson, 1987)。Murray 與 Mead 則注意到福利制度對於既有的社會約制機制的破壞將會影響與強化偏差行為 (Murray, 1996; Mead, 1996)。而如前所述，Mead 與 Wilson 兩人亦同樣的關懷所謂底層階級的工作機會問題，Mead 認為不論何種工作都是值得做的，但 Wilson 對此卻有保留。換言之，這三位八〇年代重要的理論家，他們所關注的焦點其實是互有共通性的，且深受六〇與七〇年代的理論的影響，只是對於議題的形成因素的見解不同，解決的方法亦不同。

最後，人力資本論、地位取得模型與勞力市場所著重的市場薪資取得的研究，也一直延續至 80 年代 Mead、Murray 與 Wilson 的論述之中。但不同的是，前面三個理論是著重於薪資的多寡與能力的關係，但後三者中 Mead 與 Murray，則是著重在為什麼不去取得這類薪資的問題，而 Wilson 則著重於取得市場薪資的條件限制問題。另外，雨露均霑論則成為勞力市場理論、Murray 論點與 Wilson 論點批評的主要對象，但它所提出的經濟成長對不同家庭型態有不一樣的均霑現象，則更進一步的被 Wilson 論點所補充，只不過 Wilson 所著重的家庭類型為都市內城中的黑人女性戶長家庭而已。

總之，80-90年代的貧窮理論還是不離60-70年代理論的關注焦點。注意點除了放在行為偏差的問題外，對於福利制度的反省與把它視為是形成貧窮問題的因素卻是60-70年代理論較少論及的。再者，理論的建構雖然比較複雜，但明顯的保有與整合了60-70年代的論點，其中最明顯的就是Wilson的理論。另外，這些論點有相當大的「黑色特徵」，說明的對象一直是圍繞在黑人與黑人社區上面，這種著重於某一特殊群體的理論，是相當不同於60-70年代理論。最後，本文所回顧的理論對於貧窮動態的解釋都不充足，雖然貧窮文化、人力資本與Wilson在代間貧窮（持續貧窮）上有些許的著墨，雨露均霑論與Wilson論點在總體貧窮動態上亦有些許的見解提出。然而就理論的完整性與論點的完善性而言，這些片斷見解的提出仍然是不夠的，仍有需要加強之處。

三、對臺灣的意涵

姑且不論在貧窮相關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上，臺灣與美國有一段很大的差異。單就理論形成與所欲解釋的社會背景而言，美國與臺灣的社會現況的差異性依然很大。在這些限制下，使得我們在分析臺灣的貧窮相關問題時，無法完全移植美國的理論，即使參考美國的理論亦應考慮到適用性的問題，及概念界定上的差異。但這不意謂這些理論對臺灣的貧窮相關研究無絲毫助益或值得我們借鏡之處。本文認為，除了在分析的工具上（例如：統計與研究方法）與資料的搜集上（例如：貫時性資料）美國的研究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外，他們對於貧窮相關議題的剖析角度，則有助於我們發掘我們可能遭遇的問題。以下，本文將依不同的理論簡要說明理論中值得我們參考之處。

就Murray與Mead的論點而言，他們所欲解釋的問題涉及到美國的福利制度。該一制度相當特殊與臺灣的福利制度差異亦大。然而，就他們兩者的解題方式與內容而言，兩者的論點皆提醒我們福利制度雖可作為一種解決貧窮問題的藥材，但用藥的方式與藥量的多寡皆可能影響其療效，甚至造成解藥變成毒藥的後果。臺灣自解嚴後，陸續通過與修正社會福利法案，然而受到政治情勢與社會對於社會福利的認知有限影響下，使得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面臨許多的問題。例如：全民健保的醫療資源被某些投保人濫用的事

實，這一跡象提醒我們，社會福利制度亦可能是製造社會問題的一種機制，對該制度的非預期效果我們應嚴謹看待。相同的，雨露均霑論中有關經濟成長與貧窮率間的關係，雖然在臺灣的經驗研究亦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但經濟成長背後所帶來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亦應值得我們重視。

就 Wilson 的論點而言，他的討論中有關於社區社會組織及就業機會環境轉變對社區居民所造成的衝擊，及配誤論與勞力市場理論對於工作機會與就業者能力不相稱的討論，皆十分值得我們參考。雖然兩國在經濟發展、社區組織型態與都市發展型態皆不同。然而，近年來臺灣的產業外移造成結構性失業問題，都市與社區機能改變（例如：便利商店、物流中心漸漸取代傳統雜貨店與傳統市場），兩者皆顯露出臺灣社會正在進行一個大的社會轉型。在這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人們（筆者指的是，工作能力不佳、居住環境不佳與社會資源缺乏的公民），到底受到什麼樣的衝擊，有何因應之道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就人力資本與地位取得模型而言，臺灣近數十年來教育制度改變相當大，平均教育程度逐年提昇。然而，近年來高學歷高失業的狀況時有所聞，且臺灣的經驗研究（辛炳隆，1996）亦指出，教育與現職工作經驗對於非農的自營作業者工作收入之差異毫無解釋力。這可能是我們在運用人力資本理論上應該考慮其限制性之處。至於，貧窮文化與情境觀點則提醒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貧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對於貧民特徵的描述與瞭解在臺灣的貧窮相關研究中並不多見，未來我們有必要在這個研究取向上多著力些。

前述的說明所提及的係指美國的貧窮理論可以當作發掘臺灣貧窮相關議題的思考出發點與方向。但在實際運用上卻有些限制必須審慎考慮，例如：Wilson 曾使用男性可結婚比（MMPI: Male Marriage Pool Index）來解釋（黑人單親）女性家庭的數量的變化。然而，臺灣的經驗研究顯示（薛承泰，1996），臺灣女性單親家庭的成因及組成與美國的狀況並不一樣，不僅數目不多，且以離婚及喪偶佔大多數。其次，Wilson 與 Kasarda 等人所提倡的產業與就業結構轉型對於區域貧窮率顯著的影響，但是在臺灣居住與工作場所並無明顯的分化，住商混用的狀況依然明顯，居住的社會階級區隔現象並非很嚴重（章英華與蔡勇美，1997），非正式部門的商業活動成長快速並提供眾多

的就業機會（孫清山，1997）。第三，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人力資本理論對於自營作業者的解釋力很低，而臺灣自營作業者的數量佔就業人口的比重很高，另外女性擔任無酬家屬工作者的比重亦不少。

上述的差異顯示出就實做的經驗研究而言，由於兩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背景差異很大，因而在理論概念的實際運用上（尤其是操作定義上），應修正以便貼近臺灣的現實狀況，如此才能真正的運用美國的理論概念來了解臺灣的貧窮問題。

四、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

上述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對象與解釋理由上有差異，但理論間的相互影響非常明顯。例如：貧窮文化、情境觀點、Mead、Murray 與 Wilson 等五個理論/觀點，對於貧民的行為與家庭結構的注重。而且理論的發展莫不與其當下的社會環境有關，尤其八〇年代以降的貧窮理論更是如此。不過在這些理論中一個共通的限制就是無法對貧窮動態現象，給予良好的解釋，對於家庭生活資源的解釋也太過於強調戶長自勞力市場中的薪資所得，而忽略了家庭其它成員的貢獻及家庭不同所得來源的解釋。因此我們認為，貧窮理論的發展應回歸到貧窮問題的最基礎層面：家庭，以解析貧窮成因與動態過程。

因為貧窮的定義通常是以家庭或家戶為單位，如果我們把貧窮的定義為「家戶的資源無法滿足家戶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那麼不論對於個體貧窮或貧窮數量的解釋皆應該著重於家庭資源取得過程的了解。前述我們所論及的理論與經驗研究雖已論及家庭資源的取得。但可惜的是這些理論如：人力資本論、地位取得理論、勞動市場理論及八〇年代以降貧窮理論的討論，多數還是集中在市場薪資取得的研究。例如：以人力資本論為基礎的研究通常僅討論家庭中戶長的人力資本對於家庭所得的影響，即使有些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人力資本以外的結構因素，如：家庭結構與勞力市場結構對於家庭生活資源取得的影響。但這些研究中除了 Wilson 的論點有少許的著墨外，其它論點不是忽略了，就是簡化了「家庭生活資源取得是由全體家庭成員及這些成員的支持網絡所影響的事實」。因而我們建議在研究家庭生活資源的取得時，不應忽略了勞力市場以外的所得來源與該所得的取得過程。

相同的，在貧窮動態的解釋上，不論是個體的或是總體的，皆需回顧至家庭的層面，畢竟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生活單位。事實上貧窮理論的發展，不論是貧窮文化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地位取得模型、Murray 論點與 Wilson 論點，在表面上都未曾放棄家庭與貧窮間關係的討論。然而這些理論卻對於家庭結構的變化過程未有論及。雖然在 Wilson 與 Murray 的論點談及了八〇年代單親女性家庭的大量形成之因，但我們更需要瞭解的是 Rowntree 以至 Stern (1993) 等人所討論的家庭生命週期的轉變與貧窮風險的關係。因為在家庭生命週期的每一階段中，家庭皆是由不同的年齡人口所組成，不同的人口組成的需求必定不同，所面臨的貧窮風險亦會不同，受環境條件影響的大小與對其的敏感度亦會有差異。我們認為，唯有對上述要點的了解，才可能真正的掌握貧窮動態的歷程，及提出或設計適當策略來因應之。

總之，對於貧窮的問題的解釋一直是社會科學家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檢討了 60 年代至今的貧窮理論後發現，各個理論雖在某一層面上對貧窮問題都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依然是未盡理想。因此，本文建議對於貧窮的解應該回歸至貧窮問題的最基本單位「家庭」，從此著手發展出適當的理論，整合與增補目前各理論的限制，才有助於我們對貧窮問題的理解與解決。

表 1 貧窮理論的定位

論點名稱	理論定位	貧窮動態	經驗研究(Support)	經驗研究(Review)
貧窮文化	缺乏(選擇、限制)	持貧	Lewis(1969)	Leacock(1971)
情境觀點	限制(選擇)	持貧	Carmon(1985)	Rainwater(1970)
人力資本論	缺乏	致貧	Becker(1993)	Kelso(1994)
地位取得模型	缺乏	致貧	Blau & Duncan(1967)	Hodge & Laslett(1980)
雨露均霑論	限制	致貧	Anderson(1960)	Blank & Card(1993)
勞力市場理論	限制	致貧	Tomaskovic-Devey(1988)	Kelso(1994)
Mead 觀點	缺乏(選擇、限制)	致貧	Mead(1994)	Kelso(1994)
Murray 觀點	選擇(限制)	致貧	Murray(1984)	Kelso(1994)
Wilson 觀點	限制(缺乏)	致貧	Wilson(1987)	Mincy(1994)
配誤論點	限制	致貧	Kasarda(1993)	Mincy(1994)

說明：1. 括號的分類代表該理論的次要著重點。

2. 由於各個論點的經驗研究結果並非一致，因此表中僅列出對某項論點有深入討論的文章。

參考資料

王篤強

1998 〈美國 80 年代低賤階級問題的再思考〉，《經社法制論叢》 21:445-69。

沙學漢

1974 〈貧窮文化：一個評論〉，《臺大社會學學刊》 10:41-50。

辛炳隆

1996 〈非農自營作業者就業行為之分析〉，見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與江豐富（編），《人口、就業與福利》。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許嘉猷

1986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台北：三民。

章英華與蔡勇美

1997 〈臺灣的都市經驗－過去、現在與未來初探〉，見蔡勇美與章英華（編），《臺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

孫清山

1997 〈戰後臺灣都市之成長與體系〉，見蔡勇美與章英華（編），《臺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

薛承泰

1996 〈臺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分佈與特性：以 1990 年普查為例〉，《人口學刊》 17:1-30。

Anderson, W. H. Locke

1964 "Trickling D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tent of Poverty among American Famil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8(4):511-24.

Averitt, Richard T.

1968 *The Dual Economy: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Industry Structure*. New York: Norton.

Bane, Mary J. and David T. Ellwood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1-23.

Becker, Gary S.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nk, Rebecca

1989 "Analyzing the Length of Welfare Spell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9: 245-273.

1993 "Why were Poverty Rate so High in 1980s?," in D. Papadimitriou & E. Wolff (eds.), *Pover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U.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Blank, Rebecca M. & David Card
 1993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Are They Still Connecte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285-325.
- Bloomquist, Leonard E. & Gene F. Summers
 1982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Income Distrib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3):325-38.
- Bloomquist, Leonard E., Christina Gringeri,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Cynthia Truelove
 1993 "Work Structures and Rural Poverty," in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Task Force on Persistent Rural Poverty (ed.),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Carmon, Naomi
 1985 "Poverty and Cultur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8(4):403-14.
- Corcoran, Mary
 1995 "Rags to Rags: Pover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237-67.
- Danziger, Sheldon and Peter Gottschalk
 1986 "Do Rising Tides Lift All Boats? The Impact of Secular and Cyclical Changes on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2):405-10.
- Davidson, Leonard and David Krackhardt
 1977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Disadvantaged: An Empirical Test of Culture of Poverty/Situational Theories of Hard-Core Work Behavior," *Human Organization* 36(3):304-9.
- Della Fave, L. Richard
 1974a "Success Values: Are they Universal or Class-Differentia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153-169.
 1974b "The Culture of Poverty Revisited: A Strategy for Research," *Social Problems* 21:609-21.
- Doeringer, Peter, and Michael Piore
 1971 *Internal Labor Market and Manpower Analysis*. Lexington: Heath Lexington Books.
- Duncan, Greg J.
 1984 *Years of Poverty-Years of Plent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Eggers, Mitchell L. & Douglas S. Massey
 1991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Poverty: A Comparison of Whites, Blacks, and Hispanic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17-255.
 1992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Urban Poverty: Black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between 1970 and 1980,"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75-203.
- Gans, H. J.
 1968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Study of Poverty: An Approach to Anti-Poverty Research," in D. P. Moynihan(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 Basic.
- Gordon, Davi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 Gottschalk, Peter and Sheldon Danziger
1985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fers on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153-61.
- Harris, Kathleen Mullan
1993 "Work and Welfare among Single Mothers i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2): 317-52.
- Hodge, Robert W. and Barbara Laslett
1980 "Poverty and Status Attainment," in Vincent T. Covello (ed.),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 An Evalu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 Hodson, Randy
1983 *Workers' Earnings and Corporate Economic Structur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Jencks, Christopher
1992 *Rethinking Social Policy: Race,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Harper Perennial.
- Kasarda, John D.
1983 "Caught in the Web of Change," *Society* 21:41-7.
1988 "Jobs, Migration, and Emerging Urban Mismatches," in Michael G.H. Mcgeary and Laurence E. Lynn (eds.), *Urban Change and Pover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3 "Urba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Underclass," in William Julius Wilson (ed.),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Katz, Michael B.
1989 *The Under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The New Politic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n," *Dissent* 39,4(169):548-553.
- Kelso, William A.
1994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the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erbo, Harold R.
1991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Class Conflict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cGraw-Hill.
- Leacock, Eleanor Burke (ed.)
1971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Critiqu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eeds, Anthony

- 1971 "The Concept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Conceptual, Logical, and Empirical Problems, With Perspectives from Brazil and Peru," in Eleanor Burke Leacock (e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Critiqu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ewis, Oscar

-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3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 Autobiography of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6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4):19-25.
-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Daniel Moynihan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Lichter, Daniel T., Lionel J. Beaulieu, Jill L. Findeis, and Ruy A. Teixeira

- 1993 "Human Capital, Labor Supply, and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in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Task Force on Persistent Rural Poverty (ed.),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Lyson, Thomas A., William W. Falk, Mark Henry, JoAnn Hickey, Mildred Warner

- 1993 "Spatial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Rural Poverty," in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Task Force on Persistent Rural Poverty (ed.),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Maume, David J. Jr.

- 1988 "Local Labor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Black and White Women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in Donald Tomaskovic-Devey (ed.),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London: Westview Press.

Mead, Lawrence M.

- 1982 "Social Programs and Social Obligations," *The Public Interest* 69:17-32.
-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7 "Author's Response to Reviewer," *Social Service Review* 61(2):373-77.
- 1988 "The Hidden Jobs Debate," *The Public Interest* 91:40-58.
- 1991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New Poverty," *The Public Interest* 103:3-20.
-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3 "The Logic of Workfare: The Underclass and Work Policy," in William Julius Wilson (ed),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1994 "Poverty: How Little We Know," *Social Service Review* 68(3):322-350.
- 1996 "Raising Work Levels Among the Poor," in Michael R. Darby(ed.), *Reducing Poverty in America: Views and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incy, Ronald B.
1994 "The Underclass: Concept, Controversy, and Evidence," in Danziger, Sheldon H. et al. (eds.), *Confronting Poverty: Prescriptions for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Charles
1982 "The Two Wars Against Povert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reat Society," *The Public Interest* 69(fall):3-16.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Reducing Poverty and Reducing the Underclass: Different Problems, Different Solutions," in Michael R. Darby (ed.), *Reducing Poverty in America: Views and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O'Neill, June A., Laurie J. Bassi and Douglas A. Wolf
1987 "The Duration of Welfare Spell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9(2):24-8.
- Polachek, Solomon W. & W. Stanley Siebert
1993 *The Economics of Earn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inwater, L.
1968 "The Problem of Lower-Class Culture and Poverty-War Strategy," in D.P. Moynihan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1970 "The Problem of Lower Class Cultur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6(2):133-48.
- Rank, Mark R.
1985 "Exiting From Welfare: A Life Table Analysis," *Social Service Review* 59(3): 358-76.
- Rodman, H.
1963 "The 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Social Forces* 42:205-15.
- Sawhill, Isabel V.
1988 "Poverty in the U.S.: Why is It So Persist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3):1073-119.
- Schiller, Bradley R.
1995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4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 Cautionary Not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0(2):217-22.
- Stern, Mark J.
1993 "Poverty and Family Composition since 1940," in Michael B. Katz (ed.), *The Underclass Debate: Views From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ckamyer, Ann R.
1992 "The Working Poor in Rural Labor Markets: The Example of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Cynthia M. Duncan (ed.), *Rural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Auburn House.

- Tickamyer, Ann R. and Janet Bokemeier
 1993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Labor Market Analyses: Multi-Level Models of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in Joachim Singlemann & Forrest A. Deseran (eds.), *Inequalities in Labor Market Area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Tickamyer, Ann R. & Melissa Latimer
 1993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Income Sources of the Poor and Near Poor," in Joachim Singlemann & Forrest A. Deseran (eds.), *Inequalities in Labor Market Area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Tickamyer, Ann R. and Cynthia M. Duncan
 1990 "Poverty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Rural Americ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67-86.
- Tomaskovic-Devey, Donald
 1988 "Industrial Structure, Relative Labor Power, and Poverty Rates," in Donald Tomaskovic-Devey (ed.),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 Treiman, Donald J. and Patricia A. Ross
 1983 "Sex and Earnings in Industrial Society: A Nine-Nation Comparis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3):612-50.
- Tolbert, Charles M. II
 1989 "Labor Market Areas in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Issues,"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4:81-97.
- Valentine, Charles 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lentine, Charles A. et al.
 1969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urrent Anthropology* 10(2-3):181-201.
- Wacquant, Loïc J.D.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89 "Poverty, Joblessness,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er City," in Phoebe H. Cottingham and David T. Ellwood (eds.), *Welfare Policy for the 1990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Cost of Racial and Class Exclusion in the Inner City," in William Julius Wilson (ed.),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Walker, Robert and Karl Ashworth
 1994 *Poverty Dynamics: Issues and Examples*. England: Avebury.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in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eds.), *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3 "The Underclass: Issues, Perspectives, and Public Policy," in William Julius Wilson (ed.),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 Wilson, William Julius and Kathryn Neckerman
- 1987 "Poverty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and Lawrence M. Mead
- 1987 "The Obligation to Work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Jobs: A Dialogue between Lawrence M. Mead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Focu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10(2):11-19.

Theories of Poverty in the US Since 1960s: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 Integration

Chao-hsien Lu

Ph.D.,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Te-mu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ories of poverty over a 30-year period, namely, from the 1960s to 1990s. Theories of poverty can b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ree general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lack, choice, and constraint. From these three approaches we develop hypotheses specifying possibl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poverty theories. Our analys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ulture of poverty" remained the dominant theory during the 1960s to 1990s. Other theories basically either critique the "culture of poverty" concept or attempt to amend it. While many different hypotheses concerning poverty exist among the three main theories, they are nonetheless interrelated. Moreover, all these theories share a common weakness, namely, they are inadequate in accounting for poverty dynamics. Our study indicates a strong need to bring the issue of family back into the discussion on and theorizing of poverty dynamics.

Key Words: Culture of poverty, Human Capital, State Attainment,
Trickle Down Thesis, Situational perspective